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4 年 9 月 19-20 日)

1、《美国军事评论》：人工智能作为战斗力倍增器

2024 年 9 月，《美国军事评论》期刊网站刊登美军少校迈克尔·泽奎拉（Michael Zequeira）的文章《人工智能作为战斗力倍增器：利用人工智能减轻陆军参谋人员负担》。文章回顾了美陆军数十年来在有限范围内使用 AI 的实践，展示了 AI 在复杂任务自动化和情报支援方面的进展。例如，Patriot 导弹系统使用机器学习技术来追踪空中威胁，Project Maven 项目用于无人机影像分析，而 TITAN 系统则致力于开发下一代情报能力。作者指出，AI 在军事情报收集中的应用极大简化数据分析和环境评估工作。通过自动化战场情报准备（IPOE），AI 显著简化美国陆军军事决策制定过程（MDMP）中的数据收集和分析。AI 能够生成天气影响矩阵和修订的综合障碍叠加图（MCOO），从而大幅加快地形和威胁分析速度，使情报人员能够专注更复杂的决策，提高整体规划效率。此外，AI 还可以减少后勤、人员管理等其他部门在作战计划中的工作负担。通过自动生成报告，AI 为规划人员节省大量时间，使他们能够专注于那些需要人类创造力和战略性思维的任务。然而，AI 辅助军事决策面临两

大风险：过度依赖和技能退化。过度依赖 AI 可能导致判断失误，因此需要通过训练和验证来建立对 AI 数据的合理信任，同时确保参谋人员保持独立的决策能力。技能退化和硬件限制也可能导致在远征条件下无法使用 AI，进而降低 MDMP 的效率。对此，需确保参谋人员在无技术支持下仍能完成任务，并推动硬件技术发展，以确保 AI 在复杂环境中可靠运行。

<https://www.armyupress.army.mil/journals/military-review/online-exclusive/2024-ole/ai-combat-multiplier/>

编译：高行健

2、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科学评估人工智能风险的未来

8月27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刊登副研究员哈德里安·普吉特（Hadrien Pouget）、研究学者克莱尔·丹尼斯（Claire Dennis）等人文章《关于人工智能风险的国际科学评估的未来》。7月，该基金会就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应对人工智能（AI）全球风险召开研讨会，本文为研讨会中主要观点的总结。学者们指出，随着 AI 技术快速发展，特别是高级人工智能（如通用 AI）的潜在影响，全球需要一个统一、科学严谨的评估体系。但目前没有任何单一机构或机制可以推动世界就 AI 风险问题达成科学共识。为此，学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联合国应领导成员国深度政治参与，

定期产出相关报告，提升相关报告和决策政治影响力；第二，设立专门机构，并每年发布聚焦前沿 AI 系统风险的评估报告；第三，吸纳其他国际组织或机构进入该领域全球对话；第四，谨慎协调联合国和该专门机构之间关系，以增强各自优势而不妨碍独立报告速度和焦点。这些方法有助于平衡科学与政治关系，建立一个能够及时应对 AI 风险的国际协调机制，以确保各国能够共同面对这一快速变化的技术领域。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4/08/the-future-of-international-scientific-assessments-of-ais-risks?lang=en>

编译：赵英慧

3、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军用人工智能治理走向落实

9月3日，美国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发表研究员布莱恩娜·罗森（Brianna Rosen）评论文章《绘制军事人工智能治理之路》。文章结合首尔第二届军事领域负责任人工智能峰会（REAIM）内容，表示虽然各国正在军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不断达成共识，但当前原则性共识过于笼统和抽象，难以应用于实际治理。为此，作者提出多项建议，指出以下工具将有助于原则性共识落地。首先，各国可以发布本国在军事领域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的国家战略、政策文件、框架。这应涉及解读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政策和程序，包括与使用武力和支持作战功能的情报行动有关的决策，并适当纳入在

军事场景下负责任使用人工智能的案例。其次，各国可以对国际法中相关规则进行国内转化。比如以公开辩论方式对国际法如何适用于特定的本国人工智能用例制定集体解释，同时分享法律审查的最佳实践。最后，各国应加强对政策指导、交战规则和行为准则等非法律性规则的发展。虽然当前辩论主要集中在法律监管上，但从多场军事冲突中吸取的经验教训表明，非法律性规则在实践中拥有更强伦理约束。换言之，军用人工智能治理可能更多地属于政策层面而非法律层面。

<https://www.carnegiecouncil.org/media/article/principles-action-military-ai-governance>

编译：高隆绪

4、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降低 AI 风险的承诺机制

9月13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刊登论文《降低人工智能风险的“如果-那么”承诺机制》。文章介绍了一种新兴风险应对框架，即若 AI 模型具备某能力 X，则必须实施风险缓解措施 Y，必要时将延迟 AI 部署或开发以确保措施到位，并在第二章中深入剖析这一机制的运作细节。首先，文章通过构建假设性案例，剥离商业法律干扰，直击 AI 作为化学及生物武器生产顾问的风险核心——扩大潜在制造者范围。文章认为，当前 AI 模型虽未达此水平，但未来的不确定性需要未雨绸缪。文章认为，应对挑战的关键在于预防 AI “越狱”与模型权重滥用，并据此设计“如果-那

么”承诺机制（If-Then Commitments）：当 AI 模型触及风险阈值，即需确保在无法诱导其提供有害建议的环境下部署，并安全保管模型关键数据。此承诺旨在平衡风险降低与成本考量，针对具体风险制定具体措施。现有 AI 企业政策如 OpenAI 的准备框架，已设立类似“门槛”机制。Anthropic 与谷歌 DeepMind 分别提出了 AI 安全级别（ASL）与关键能力级别（CCLs）框架，以应对 AI 潜在风险。两者均借鉴生物安全标准，设立不同级别的安全、安保及运营措施，以确保 AI 能力发展风险可控。此外，这些框架还包含暂停 AI 部署的条款，以防安全准备不足。文章提出，此类“如果-那么”承诺有助于平衡不同风险观点，明确 AI 评估目标，助力 AI 开发者规划风险缓解路线图。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4/09/if-then-commitments-for-ai-risk-reduction?lang=en>

编译：孙叶秋

5、《新印度快报》：为何要积极制定 AI 法规

9月13日，《新印度快报》在其网站刊登印度总理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阿迪塔·辛哈（Aditya Sinha）的文章《为何要积极制定 AI 法规》。文章提到，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和 2000 年代初，印度 IT 行业快速发展为监管研究提供一个独特案例，尤其是在预先监管缺失方面。当时，全球监管机构忙于处理 IT 领域复杂性，而印度的政策制定者则大多持观望

态度。监管空白为创新提供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行业都应缺乏预先监管。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认为，如缺乏有效监管，行业可能操纵监管机构以谋取私利。美国经济学家在 2020 年的研究中探讨了自动化和 AI 对经济和社会的广泛影响，并强调了积极监管干预的重要性。预先监管要求监管机构能够预见风险，并制定法律标准以预防系统性失败和不道德行为。监管机构面临的挑战包括信息不对称，这要求他们制定既符合法律又具有高度适应性的监管措施。欧盟最近通过的《人工智能法案》采用基于风险的监管框架，但因过于简化风险而受到批评。美国采取了更具体的行业方法，发布了关于 AI 使用的指导方针。英国强调基于原则的框架，而中国则采取了严格的中央监管框架。这些不同的监管方法凸显了印度在制定有效的 AI 监管时面临的挑战，印度需进一步探讨适合本国的监管策略。

<https://www.newindianexpress.com/opinions/2024/Sep/12/why-we-need-to-be-proactive-on-ai-laws>

编译：刘嘉滨

6、CSIS：AI 与先进技术战斗：作战指挥与服务部门协作

9 月 13 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网站刊登格雷戈里·艾伦（Gregory C. Allen）、斯凯勒·摩尔（Schuyler Moore）和贾斯汀·法内利（Justin Fanelli）的访谈文章《AI 与先进技术战斗：作战指挥与服务部门协作》。

文章从三个技术官员视角介绍如何推动美军在各作战指挥部与技术开发部门之间的合作。首先，文章认为，作战指挥部（如 CENTCOM）与服务部门（如海军、陆军）之间的协作旨在提升指挥效率和作战能力。这些部门合作的重要任务是如何将 AI 等先进技术有效应用到作战和决策中。其中，技术官员（CTO）作用与商业领域不同，国防领域的 CTO 不仅要推动技术创新，还要确保技术能在短期内实现快速部署。例如，CENTCOM CTO 强调了新技术的快速验证和过渡过程。其次，文章特别提到 CENTCOM 正在运行的一系列数字化演习（如 Digital Falcon Oasis），通过 90 天为周期的小规模实验，确保 AI 和数字工具可以有效应对实战需求。这些演习主要测试目标识别、任务执行和信息整合等技术应用。在反无人机（UAS）系统方面，CENTCOM 的 Desert Guardian 系列演习集中解决传感器数据整合问题。文章认为，技术整合和数据共享是应对现代威胁的关键。各方需要确保传感器、射手和指挥系统之间能够无缝协作，以提升应对效率。作战指挥部在未来将继续依赖技术创新与服务部门紧密合作，技术应用的成功不仅依赖技术本身，更依赖于各部门之间协作与信息共享。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i-and-advanced-technologies-fight-combatant-command-and-service-collaboration>

编译：张振

7、CFR：为何美国大选对“印太地区”至关重要？

9月16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网站刊登系列文章《为什么美国大选对“印太”地区至关重要？》。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梅里·卡巴莱诺-安东尼（Mely Caballero-Anthony）认为美国大选将深刻影响该地区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特朗普连任预示着“美国优先”、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回归；而哈里斯当选则将重申美国的多边主义，强化贸易、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合作。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所所长邵育群认为，美国大选将通过议程设置、资源配置、政策调整等方面影响中美关系。特朗普和哈里斯在对华政策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政策团队、政策优先级和政治风格方面。特朗普可能施行更强硬的经济和贸易政策，而哈里斯则可能延续拜登政府的科技竞争策略。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执行主任迈克尔·富利洛夫（Michael Fullilove）认为，“印太”地区密切关注美国总统选举的三个关键问题：新总统的世界观、如何处理美中关系以及对“印太”盟友的态度。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以及哈里斯“盟友优先”使得“印太”地区的盟国普遍支持哈里斯。美国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执行董事德鲁瓦·苏杰生（Dhruva Jaishankar）提到，尽管两党对华政策趋同，但特朗普或哈里斯执政将影响美国安全策略和经济参与，对该地区供应链安全和投资伙伴关系至关重要。因此，“印太”各国将密切关注美国选举结果。

<https://www.cfr.org/councilofcouncils/global-memos/why-us-presidential-election-matters-indo-pacific>

编译：陈露娴

8、布鲁金斯学会：美国与台湾的安全伙伴关系为何重要

9月16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刊登客座高级研究员卜睿哲（Richard C. Bush）的文章《美国与台湾的安全伙伴关系为何重要》。文章认为，下届美国政府需要谨慎处理美台安全伙伴关系。文章认为，当前台湾面临解放军军事和非军事胁迫两种威胁。军事胁迫上，解放军具有对台力量投射能力，能够有限进攻，但尚不具备两栖进攻能力；非军事胁迫上，在赖清德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大陆方面使用多种非战争策略消耗台湾地区公众信心削弱台独势力。大陆上述两种手段均对美台安全关系构成了严重挑战。当前，美台存在七个合作问题：防御策略上，台当局偏爱常规防御，但美国则坚持“不对称防御”更加有利；国防预算上，美国一直敦促台当局提高国防支出；台独问题上，美方面应要求台当局保持克制；对台承诺上，美国不应公开承诺保卫台湾；应对非军事胁迫上，美国应加强应对网络攻击等领域的专业合作，并改善美台经济关系、公开支持台湾行动；台对陆政策上，由于大陆市场吸引力下降和大陆对政治谈判的要求，台湾将不会采取更温和的对陆政策；美国大选后的政府构成、国会选举结果等因素均会影响美国立场，作者认为，哈里斯

政府可能会继承拜登的对台政策，而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将混乱不堪。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why-does-the-us-security-partnership-with-taiwan-matter/>

编译：熊梦溪

9、大西洋理事会：近岸外包如何从空谈到现实

9月17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刊登Adrienne Arsht 拉丁美洲中心（AALAC）近岸工作组发布的《从空谈到现实：美洲的近岸外包》报告。报告主要探讨美洲地区近岸外包理论与实际行动的关系。报告强调了拉美与加勒比地区在支持美国公司增加与增强供应链多样化与韧性方面的潜力。报告提出三个主要条件，认为这些条件是实现近岸外包所必需的：一是改善国内“吸引力”因素，如现代化港口和电信基础设施、改善边境口岸的软基础设施、提供可靠和清洁能源以及提供法律确定性和加强制度建设。二是利用美国的“推动”因素，包括利用现有贸易政策、根据美国战略目标调整发展和投资政策以及利用美国政府现有工具箱。三是加强公私部门合作，包括加强劳动力发展、通过多部门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此外，报告还强调美国政府和公司在推动近岸外包方面的重要作用。报告认为，近岸外包为美洲地区国家提供吸引新投资和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机会，也为美国提供深化与该地区经济接触并抵消中国在该地

区影响力的机会。报告呼吁区域各国、美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共同努力，将近岸外包从空谈转化为现实。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report/from-rhetoric-to-reality-nearshoring-in-the-americas/>

编译：张思薇

10、布鲁金斯学会：美菲联盟和 2024 年美国大选

8月9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刊登东南亚研究李光耀讲席教授、亚洲政策研究中心外交政策研究员郭玲玲（Lynn Kuok）文章《美菲联盟和 2024 年美国大选》。文章认为，当前，美菲关系日渐成为美国与东南亚地区伙伴关系的基石，菲律宾也对美国国家利益具有重要作用。但美菲联盟的未来将受到 2024 年美国大选和新政府外交政策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回顾双边关系认为，历史上的美菲关系历经起伏，但菲律宾政府不断加强防务合作，加深和美合作，使得双方关系回暖。但同时，当前与中国关系紧张使得菲律宾面临“严峻安全形势”。对此文章认为，2024 年大选后的美国新政府应优先维护与菲律宾关系，促进具体经济合作、缓解南海紧张局势，并在与中国互动中保持明确立场。此外，美国还应加强与东盟国家关系，以便在地区安全动态中发挥积极作用。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the-us-philippines-alliance-and-the-2024-us-elections/>

编译：张成昊

11、布鲁金斯学会：培育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伴关系

9月16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其网站刊登亚洲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杨伟雄的文章《培育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文章认为，近三年半以来，美国在亚洲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在双边关系、多边组织和跨区域网络上得到革新和增强，而大选将对其后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受亚洲区域安全环境变化和供应链脆弱性增加等经济安全挑战的推动，新老伙伴与美国合作不断深化，特别是在菲律宾总统过渡后，美国在南海的军事基地使用权和对抗中国的能力上升。第二，若特朗普执政，则美台、美韩以及区域经济关系等问题的不确定性将会提升，但下一届政府中的关键职位以及两院也将影响政策方向，政策连续性仍然可观。第三，两党在“印太”地区的观点存在必然趋同，尽管特朗普出言贬低，但两党都需要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切身利益。最后，文章建议下一届美国政府继续管理和培养相关关系，注重倾听盟友需求而非强加自身意志，避免将东南亚以及东盟地区卷入中美竞争并加强对亚洲经济议程关注以遏制中国技术与经济进步。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cultivating-americas-alliances-and-partners-in-the-indo-pacific/>

编译：孙钰涵

12、传统基金会：美国不应加入联合国《未来契约》

9月16日，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刊登国际监管事务高级研究员布雷特·谢佛（Brett Schaefer）文章《美国必须反对联合国〈未来契约〉》。作者认为制定《未来契约》是一种并不明智的努力，它将赋予无法履行当前职责的联合国额外责任。相比于试图恢复联合国作为处理世界事务的中心地位，秘书长更应呼吁重估联合国行动效果、裁员和重新调整联合国关注重点。不切实际的《未来公约》只会转移联合国注意力，且若其未达到承诺目标，将进一步损害联合国声誉。作者认为，《未来契约》与美国政策存在冲突：第一，它重申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在涉及其当事方的案件中遵守国际法院的决定。与美国已经撤回的对国际刑事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同意相违背；第二，它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包括发展权。但美国尚未批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人权条约，也不承认其所规定的“权利”和“发展权”。因此，美国不应该加入《未来契约》，同时国会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保护美国利益：第一，有权宣布美国没有义务遵守这种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第二，申明支持美国长期以来扣留或限制美国对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提供资金的做法；第三，保护美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第四，认识到联合国对人权保护的局限性；第五，反对联合国安理会过度扩张或大幅增加新常任理事国。

<https://www.heritage.org/global-politics/report/the-us-must-opp>

13、大西洋理事会：拜登不应放弃留下外交政策遗产的机会

9月19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刊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弗雷德里克·肯普（Frederick Kempe）撰写的文章《拜登不应放弃留下外交政策遗产的机会》。文章提出，在拜登任期的最后4个月里，由于对乌克兰问题过于谨慎，拜登可能放弃持久、积极的外交政策遗产，这一前景令人不安。一方面，拜登比其他任何全球领导人更明确美国面临的挑战，即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国之间的关联日益密切，即四国之间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和国防工业合作”，并在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爆发后不断升级合作。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担心加剧乌克兰危机，限制对乌军事援助和武器使用。正是拜登的谨慎鼓励了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朗继续加强合作。如果拜登政府不取消对乌克兰武器使用的限制，乌克兰的打击能力将受严重限制。俄罗斯不断发动的攻击正摧毁乌克兰基础设施，并严重限制乌克兰取胜能力。遗憾的是，拜登临近任期结束，可能无心且无力领导美国，新当选的哈里斯或连任的特朗普面临重大挑战。但如果拜登政府利用接下来的四个月加强乌克兰在这场全球竞争中的前线地位，他仍有机会载入史册，并让继任者的工作更轻松。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inflection-points/>

biden-shouldnt-throw-away-his-shot-at-a-foreign-policy-legacy-
it-starts-with-ukraine/

编译：宋琳琳

编译：陈露娴、熊梦溪、张思薇、张成昊、孙钰涵、李瑾菡、
宋琳琳、刘嘉滨、赵英慧、张振、高隆绪、高行健、孙叶秋

审核：周武华、申青青、张丁、郑乐锋